《科学文化评论》第 1 卷 第 5 期（2004）：

经典流脉

五个半乌托邦

温伯格[①]

当我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我读过相当多的科幻小说。尽管我早就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但科幻作品吸引我的，反倒不是其中的科学成分，而是其中所描绘的未来社会图景，不管好与坏，可能迥异于我们自己的想象。这就把我从科幻小说引向了乌托邦文学：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和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同时也把我引向了反面乌托邦文学：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开创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近些年我的兴趣主要在其他方面，但在踏上新的千禧年之际，自然就会停下来想一想，未来等待我们的，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乌托邦，抑或是何种反面乌托邦。

上个世纪末[②]曾有过大量这类推测。契柯夫（Anton Chekhov）的小说《三姐妹》（刚好写于 100 年前）中的人物，似乎就被乌托邦式的梦想迷惑住了。比如，第二幕中的维尔希宁（Vershinin）上校：

> 再过一两百年，或是一千年，人们将以一种新的、一种更幸福的方式生活。我们当然看不见了——但这正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所在。这是我们受难的缘由。我们正在创造它。这是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所能体会的唯一幸福，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

维尔希宁的愿望并没有在这个世纪得以完满地实现。19 和 20 世纪最盛行的乌托邦理念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到处都失败了。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带给我们的不是乌托邦，而是可怕的反面乌托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19 世纪，在乌托邦思想的全盛时期，马克思本人却对乌托邦思想嗤之以鼻，并声称自己接受的是历史科学的指导。当然，那里没有什么历史科学，但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即使我们能够判定，某种类型的政府或经济是历史必然的，就像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到来一样，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我们愿意要的。如果马克思是一个真诚的乌托邦主义者，并且认识到自己有义务去描绘那个自己想要实现的社会，那么他或许从一开始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项事业最终将走向独裁。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也是一片乌托邦辞令声中出发的：那是社会主义加上某种优等种族的疯狂念头。

编者按："五个半乌托邦"（Five and a Half Utopias）是著名物理学家、1979 年诺贝尔物理学家得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物理学与天文学教授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为迎接新的千禧年而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最初发表于《大西洋月刊》2000 年 1 月号（*The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 2000, vol. 285, no. 1, pp. 107—114），随后收入温伯格的文集 *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47—263)。这里的翻译业经《大西洋月刊》转温伯格首肯，译文润色时参照过李国伟先生的台湾译本，个别地方还参照过"岁月如诗"的网络译本。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文中表述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或译者的观点。事实上，作者对社会主义怀有偏见，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表现出自己的无知。作者自己所提出的半个乌托邦，差不多是对美国制度的美化。选译这篇文章，并不是因为作者的论证多么有力或者何等精致——远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因为作者所讨论的问题，正是国内学术界近年颇为关注的，比如市场经济、精英政治、第三部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技术创新、全球化等等。这里的翻译力求忠实于原文，望读者能够保持批判的头脑。

[②] 指 19 世纪末。——译者注

即使如此，我也难以相信，乌托邦贩子已然绝迹。事实上，有五种非社会主义类型的乌托邦（及其各种组合）似乎正在登上公共话语的舞台。我们最好提防一下销售这些乌托邦思想的人；这些乌托邦思想都摒弃了一种或多种曾在昔日激发出最佳乌托邦理念的伟大理想——平等、自由，以及生活和工作的质量。

自由市场乌托邦

政府对自由企业的妨碍消失了。政府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功能，仅仅局限于惩治犯罪、保障契约和提供国防。摆脱人为羁绊之后，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繁荣世界。

这种类型的乌托邦优点在于，它不依赖于对人性之改善作出何种假定，但这也不表示我们就得喜欢它。纯粹出于论证的便利，我们不妨假定，自由市场使某种东西（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帕累托效率？）达到最大化。不管是什么吧，我们仍然必须认清，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实现最大化的东西。

有一种东西显然没有被自由市场最大化，那就是平等。我说的是平等本身，而不是那种苍白的替代品，所谓机会平等。无论给予才智之士以高回报是出于何种目的，我总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才智不高的人就理当少得一些世上的好东西呢？除非有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否则看不出有何种方式能够促进平等，以及为那些可能会滑出经济底谷的人们提供保障。

并不是所有人都重视平等。柏拉图就不怎么重视，特别是在他的英雄——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体处死之后。柏拉图借助社会与灵魂的类比，阐述了其理想国中严格的社会分层：管理者是理性部分，士兵是活力部分，而农民及匠人是更低的等级。我不清楚他对何者更感兴趣，是把自我隐喻为国家还是把国家隐喻为自我？但不论如何，这种肤浅的类比在此后两千年多中一直宽慰着那些安逸之人。

在历史上，平等的梦想曾经是乌托邦思想背后的情感驱动力。当 1381 年英格兰的农民和工匠反抗封建制度时，他们的口号就是鲍尔（John Ball）在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布道时的韵句："当初亚当耕地夏娃纺织，请问那时何人又是绅士？"法国大革命把平等与自由、博爱一起列为三大目标之一；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Louis Philippe Joseph）为了讨好雅各宾党人，改名为菲利普·爱卡利蒂（Philippe Egalité[①]）。（无论是他的新名字还是他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四都未能挽救公爵的性命，他和国王以及其他数千法国人一道登上了平等的断头台。）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结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贝拉米将自己《回顾》的续作径直定名为《平等》(*Equality*)。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 20 世纪，渴望平等的热情被用来为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辩护，那里人人都沦为平等的贫穷。每一个人，当然除了极少数政客和名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这些人能够获得好的住房、食品和医疗。平等主义或许是乌托邦思想中因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变得最为声名狼藉的那个侧面。如今，任何鼓吹更加平等的财富分配之人，都有可能被指责为试图复活阶级斗争。

当然，有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乐队的小提琴家、工厂的经理、或美国棒球协会的投手。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平等的理想不久就让位于"唯才是举"（*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据说拿破仑军队里的每一个士兵背包里都装着元帅指挥棒，当然没人会认为能有很多士兵用得着它。就我自己来说，当我在自己工作的物理系挑选研究生和助手时，肯定会反对一切放松标准的建议。但势必随才能不平等而来的头衔、名望和权威方面的不平等，业已为雄心壮志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那么，真的还有必要在这些

[①] Egalité 法语中即平等之意。——译者注

诱因之外添上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吗？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纯粹从经济立场来判断。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报酬的不平等有着重大的经济功能：正如不同食品在价格上的不平等有助于调整农业资源的分配，从而生产出人们爱吃的东西一样，劳动和资本的不平等报酬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寻找工作或进行投资，以获取最大的经济价值。这些不平等在于它们对当事人的影响，小麦和黑麦的相对价格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们只是履行辅助调整生产和资源的经济功能。但不管它的经济功效是什么，财富的巨大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罪恶，毒害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生活。

那些在安逸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把一切缩小不平等的努力都称之为“妒忌的政治纲领”。富人要想了解不平等造成的危害，最好是去看看美国文学，因为美国是按财富论阶级倾向最明显的国家。这种危害在德雷塞（Theodore Dreiser）的小说中有着尖锐的描写，德雷塞是在镀金时代的贫困环境中长大的，其时美国在财富方面的不平等可谓登峰造极。或者想一想凯瑟（Willa Cather）的故事“保罗案件”（Paul’s Case）吧。少年保罗对有钱人生活的绝望追逐，驱使他用一生的沉闷生活来换取数日的奢华享受。

显然没有被自由市场最大化的另一样东西，就是文明。“文明”我不仅仅是指艺术博物馆和大歌剧院，而是涵盖一切不仅辅助我们维生、而且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公共和私人物品。每个人都可以开列自己的清单；就我而言，文明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和美丽的古城风光，但不包括电话推销或拉斯·维加斯。文明是精英品味的；只是偶尔，它才适合大众的口味，因此没有个人牺牲或政府行为的支持（无论是以政府津贴、规章制度还是以税收政策的方式），它就不可能繁荣。

文明中与我的职业相关的那个侧面，是基础科学研究，比如寻找自然界的基本定律，或者宇宙或生命的起源——这类研究可不能用预期经济收益来衡量其正当性。我们看到，随着东欧开放自由市场经济，与所有好东西一道而来的，是那些国家中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机构的荒废。在美国，电话工业向自由市场力量开放，业已导致贝尔实验室中纯科学研究的彻底毁灭，该实验室曾是全球第一流的私立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假如让平等和文明在自由市场中任其沉浮，所换来的是，政府功能萎缩之后人们不再遭受压迫，那么这或许还是值得的。但这是一个幻觉。对许多美国人来讲，暴政的危险不在政府那边，而在雇主、保险公司或健康医疗机构那儿，并且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免受其害。说一个工人可以通过找到一份新工作而逃避某个雇主的压迫，就跟说一个公民可以通过移民来逃避某个政府的压迫，差不多同样逼真。

精英乌托邦

公共事务交由一个智力优越、教养良好的领导阶层来管理。

这是柏拉图的设想。在《理想国》以及其他对话中，柏拉图描绘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其中农民和工匠接受着优生优育的“管理者”的统治；在《克里底亚》（*Critias*）篇中，他设想，这就是与亚特兰蒂斯人发生战争之前，即九千年前的古代雅典政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就说过，只需要一个精英阶层，占总人口的 3~5%，就能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着大概也会同意这一点，我想他们甚至会认为，3%都太多了。即使像法国和日本那样的民主国家，也都是从特殊的教育机构——法国的高等学院和日本的东京大学——来选拔权力集团的成员。

在过去几年东亚经济衰退之后，李光耀以及其他人所主张的“亚洲模式”专家政治论显得不怎么令人信服了。甚至在此之前，森恩（Amartya Sen）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就指出，威

权政府在经济方面一般说来比民主政府表现要差，遇到经济灾变的风险也更大。不过，精英统治还有许多更糟糕的缺陷。

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即使由一个精英阶层组成的政府管理有方，效率卓著，并且充满了公共热忱，也会带来将公民变成儿童的后果。更何况，我们迄今尚未看到一个这样值得信赖的政府。每一个奥儒略（Marcus Aurelius）背后，都有一个柯莫图斯（Commodus）这样的狂妄亲戚，迫不及待地等着接掌大权。

从来就没有一个统治精英阶层，最终不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从特殊的社会部门来选拔精英也无济于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在攻击马克思时就指出，工人不可能成为政府的领导，因为一旦将他们置于领导地位，他们就将不再是工人，而是变成了统治者。在《回顾》中，贝拉米争辩说，一旦生产工具交到国家工业大军手中，劳工组织就会成为多余的，因为那时工人将拥有他们自己的工厂。但苏联的劳工经验并没有证实这一论点，哪怕是一丁点儿。我们也没有理由设想，从商业领袖中选拔出来的统治精英会表现得更好。威尔斯（H. G. Wells）和其他乌托邦分子曾设想将公共事务交到科学家手中，但我很了解我的同侪，因而对此提议不抱多大热情。大多数科学家宁愿做自己的研究，而不愿意去管理任何人。我知道在许多大学的物理系，教员都在竞争不担任系主任的特权。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科学家比其他人更适于管理一个国家。

权力在任何精英手里都是不安全的，但在人民手里同样也不安全。放弃对直接民主的一切制约，就意味着让各少数派服从于多数派的暴政。若是没有精英司法部门的干预，许多国家的多数派可能仍在实行种族隔离，并且至少已经在公立学校安排了祈祷时间。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正是多数派支持国家强制推行宗教划一。

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该信任谁去行使政府权力？吉尔伯特（W. S. Gilbert）提出过一个美妙的简单答案。在萨伏依（Savoy）歌剧院上演的歌剧《乌托邦有限公司》（*Utopia, Limited*）中，国王行使所有权力，但随时都有下台的危险，因为有两位贤人有权将他移交公开轰人的机构（the Public Exploder）。他们解释说：

> 我们的职责就是监视
> 　　国王的不法行为，
> 同时密切留意
> 　　他所有的乖张举止。
> 如果他耍任何把戏
> 　　染上了流氓的气息，
> 无需任何正式手续
> 　　我们就可以将他处死。

我们必须习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实世界里，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答案，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我们所能期待的最佳办法，就是将权力广泛地分散在众多相互冲突的政府及私立机构之中；在对抗其他机构的越权时，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是你的同盟——颇像今天美国所实行的那一套。

宗教乌托邦

宗教复兴潮流席卷全球，逆转了启蒙时代发端的世俗化进程。许多国家追随伊朗的范例，认可宗教领袖同时作为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美国回到其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历史源头。科

学研究和教育被限制在不会削弱宗教信仰的范围之内。

确实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宗教是解决当代世界诸多难题的良方。在整个历史中，人们对于相互之间的宗教差异如鲠在喉，这一可悲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今日，在北爱尔兰、巴尔干、中东、苏丹和印度皆是如此。但即使是宗教战争，也没有强制推行的宗教划一那样可怕。在各种能够压迫我们的精英统治中，最危险的就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他们的权力更大，因为他们还威胁说能在另一个世界惩罚我们；他们的影响更深，因为它插手了本该留给私人抉择的事务，比如性行为和家庭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已经从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这些国家领略到，基于宗教划一的乌托邦大致是何模样；在那些国家里妇女的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圣战的念头已经侵蚀到儿童的心灵。

宗教领袖或许会反驳说，上述案例中的危害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的堕落所造成的。但在整个历史上，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一直占据着宗教生活的核心。到底有哪些变化，使得当今世界某些地区的某些人认为，所有这些纯粹是由于真正的宗教生活之堕落所造成的？是不是获得了新的超自然启示，或是发现了失传的神圣经典，使得宗教教育获得了新的曙光？没有——启蒙运动以来，广泛传播的是理性信念和人道主义，这进而影响到宗教信仰，使得宗教宽容精神传播得更广。并不是宗教增进了我们的道德感；事实恰恰是，我们在道德价值方面纯粹世俗性的进步，处处都改进了宗教实践的方式。人们是否怀有信仰，应该依据他们是否相信宗教的教导，而不应当对宗教会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抱有任何幻想。

绿色乌托邦

世界背离工业化的方向，转回到更纯朴的生活方式之中去。小型社区自己种植粮食，自己动手修建房舍、制造家具，使用的电能纯然来自阳光、风力和水流。

这种乌托邦经常出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之中，比如，拉·桂恩（Ursala Le Guin）的科幻小说。但现代作家倾向于把他们的乌托邦安置在其他行星上。就描写我们地球上乡村乌托邦来讲，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90 年的作品《来自乌有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或许无人企及。（顺便说一句，莫里斯的书名回应着是莫尔的书名，Utopia 的希腊词源可能是 eu- + topos，意思是“好地方”，也可能是 ou- + topos，意思是“没地方”。这第二层意思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写《乌有乡》[*Erewhon*]时就使用过，Erewhon 无非是 nowhere 的倒写——严格来讲又不是，可见要完美有多难。）在莫里斯描写的未来英格兰，哈迈斯密斯（Hammersmith）和肯辛顿（Kensingdon）又变成了小村庄；国家政府也成了多余的；国会大厦被用来储藏肥料。莫里斯让他的主人公从伦敦一路划船游到泰晤士上游河段，并借助他的眼睛描绘了未受工业污染的乡村美景。这当然是美极了，但肯定会有人怀念伦敦的都市生活。

那些无需辛勤劳作的人，很容易把重体力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抹上浪漫的色彩。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就认为，没有一个国王能像农夫那样安睡：

> 填饱肚子，空着脑子，
> 裹着粗面包，早早入梦；
> 从不看阴森的黑夜，那地狱的儿子，
> 倒像是一个小厮，从日出到日落
> 在太阳神眼皮底下挥汗，夜间

就在至福乐园里酣眠；次日黎明
又一骨碌起身，忙着帮太阳神套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赶着这营生，直到进入坟墓。

我怀疑有哪个真正的农民会这样看待农场生活。用布洛克斯（Mel Brooks）的话说，“做国王太美了”。

有些乌托邦，比如威尔斯的《解放世界》（*The World Set Free*），愿意在保留技术之益处的同时，恢复昔日的自然环境，办法是大幅度降低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其他一些人，比如莫里斯，则幻想非技术的乌托邦也能支撑现在这么多人口。这一点我不相信；即使相信，我也不愿放弃建造心脏去纤颤器和粒子加速器的技术。事实上，莫里斯在骗人。他提到某种“力”，可以辅助我们完成那些必不可少的、但手工又无法完成的工作；但没有现代工业设施，哪来这样的“力”？

对技术的敌视也助长了对科学的敌视；科学揭示世界所带来的不安，为这种敌视添加了新的燃料。1994 年 7 月 4 日，捷克诗人兼政治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演讲时，就抗议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偶然产生的怪物……我们与整个宇宙神秘地联系在一起。”他呼唤“一种全新的、后现代的科学”。哈维尔乐意纳入这种新科学的条目之一，就是盖亚假设（Gaia hypothesis）；按此假设，地球和地球所承载的生命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如果盖亚假说不单纯是生命与其环境相互作用这一浅显事实的诗意表述，那么它就是神秘兮兮的胡言乱语，只不过带有哈维尔明显喜好的淡绿色调。这种恣意抽取科学中的轻快内容、同时诅咒所有其余部分的勾当，不过是老掉牙的做法。《来自乌有乡的消息》中的未来英格兰居民就在从事某种科学；到底是那种科学，莫里斯也只能说不同于 19 世纪的“商业化”科学。对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的科学作如是评论，确实令人惊讶。莫里斯乌托邦中的科学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无非是采集漂亮的石头和蝴蝶。

技术乌托邦

信息处理、机器人、合成材料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使得与财富分配相关的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随着整个世界被光纤网络连成一体，国家的边界也变成无关紧要的了。

这里有一种倾向，就是夸大技术将会改变我们生活的速度。离 2001 年还有整整一年，但我怀疑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商业化月球飞行的设想到时能否实现。独特的技术都会达到平台期，此时再进一步改善已没有多大价值。比如，自从 40 多年前波音 707 投入使用以来，乘坐商用飞机的体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协和是一个例外，但从反面也证明了这一法则；它从未收回开发成本。）计算机技术显然尚未达到其平台期，但它也会的——也许是在晶体管元器件达到微型化的极限，也就是单个原子尺度的时候。成功的技术一旦能为大众所用，就会接近自我极限。我不相信，从东河到哈德逊河穿越曼哈顿，今天坐汽车就肯定比一个世纪前坐公共马车快。互联网也开始出现了堵塞现象。一想到未来中国和印度的 20 亿台空调，每台都向地球大气排放热量，我就不寒而栗。

当然，不论需要多长时间，新技术必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其中有些变化非但不能将我们带入乌托邦，反而会引起极大的恐慌。技术显然给了我们毁灭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的力量。再有，假如有一种新的医疗技术，可以让人的年轻时代延长几十年，但只有特富之人消费得起，我想，没有什么比这对普通人的情感更具有破坏性了。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假如技术使得大多数人不必工作，那么这些人干什么？正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言，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爱和工作。工作给予我们自我认同感和自我谋生的尊严感，它是我们许多人离家外出的主要原因。在“机器停了”（The Machine Stops）中，福斯特（E. M. Forster）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极度舒适的世界，那里人们相互隔绝，每个人都呆在一个全方位护理的机器里。他们的生活令人毛骨悚然，所以当故事的标题变成真实景象后，读者莫不如释重负。

有些乌托邦设想，工作问题将不成其为问题。威尔斯曾含糊地提出，技术带来普遍富裕之后，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艺术家；贝拉米认为，当工人在 45 岁退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从事艺术或科学。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传布普遍的悲惨境遇。即使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也只能读那么多新文学，听那么多新音乐，或者看那么多新绘画或新雕塑，而为了选择最好的，每个人都会被拉向相同的一些作品。结果，不管他们在工作中获得多大乐趣，绝大多数作家、作曲家、画家和雕塑家劳碌一生，留下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科学家也是如此。如今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即使想读完某个狭窄分支的所有论文都是不可能的了，结果，理论物理学的大多数文章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莫里斯将现代技术从其乌托邦中剔除，不仅因为他爱恋中世纪，而且因为他想为人们保留工作。尽管对许多人来讲，现代技术使工作变得更难令人满意，但我想莫里斯错了，因为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流水线上枯燥的重复性工作，正是未来要全部交给机器来做的。技术创造了更好的工作，从汽车修理工到宇航员。但技术的进步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并且从短期来看，它还把就业很糟的人变成失业者。

技术乌托邦能够吸引某些人，因素之一就是世界因技术而统一的前景。在威尔斯《解放世界》中，所有国家的边界都消失了；这里有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统一的世界语言（当然是英语啦），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以及可以按固定汇率相互兑换的各种货币。在贝拉米的《回顾》中，还有一个联合国存在，但它的公民都期待着最终的世界统一。

物理学家（是他们发明了万维网 www）已经参与了早期形态的世界统一。比如说，在全世界，我们共享一种基于英语的数学符号排版系统 LaTex。我最近与一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物理学家合作，做一些量子场论方面的工作；他正在日本访问，我们就用电子邮件在德克萨斯与日本之间来回传递 LaTex 格式的方程式。

我不敢肯定，世界统一完全就是件好事。起码，它缩小了我们生活的心理空间。几百年前，地图上的广大区域都是空白，人们可以自由想象那些地方居住着各种奇异的动物和居民。据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试图尝遍大英帝国版图内的所有水果，但即使是她，也没有机会尝尝芒果或榴莲果。现在我们能飞到世界各地，在自家门口的超市就能买到芒果。但这不是我的乌托邦理念。假如只能在印度吃到芒果，那么吃一个芒果岂不是更令人兴奋？假如你要去的地方与你所离开的地方没什么两样，很快到达那个地方又有什么意义？

比起将来人人都负担得起的时候如何使旅行变得仍然有趣的问题来，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在语言差异和国家边界的隔离之下，都代表着与过去的珍贵联系，同时也蕴含着未来创造出独特的崭新艺术和思想的机会。所有这些正在受到世界统一进程的威胁。

现在我已经说了五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的各种难处，那么我个人又能提供什么呢？这可不容易。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能告诉我们，如何公平处理统治精英的危险与多数统治或自由市场的危险，或是如何平衡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但我仍不禁要提出一个自己设想的乌托邦，当然它要朴实、温和得多。

文明、平等的资本主义乌托邦

生产仍然基本上控制在相互竞争的私人企业手中，企业接受民主政府的监督，而政府又得接受独立法院的监督；这些企业依然利用高薪、地位和权威来吸引具有特殊才能的工人和经理，利用红利来吸引资本。那些高收入人群只能保留部分所得；为避免剩余部分全部纳税，他们也可以将其中大部分捐给博物馆、大学以及其他自己乐于捐献的机构，得到的好处从道德上的满足感到歌剧院的好座位。这些非盈利机构利用捐款投资商业企业，最终取代富裕的个人而成为工业企业的所有者。

不太富有创意，是吧？是的，事实上它不过是某些当代趋势的自然发展。在过去的 15 年里，非盈利机构是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但眼下美国的政治潮流似乎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正在放弃反抗不平等的最好武器：累进所得税制，即征收一切方式收入的所得税和大笔遗产附加税。急剧累进的所得税，若伴之以对慈善捐赠的慷慨减免政策，就会带来另一大好处：博物馆、交响乐团、医院、大学、研究实验室和各种慈善团体，因获得公众资助，不用再受政府的控制。奇怪的是，慈善捐款的免税额度总是受到福布斯（Steve Forbes）和斯坦因（Herbert Stein）这类保守实力的全面或局部攻击，尽管它是美国特有的令文明价值获得政府支持、却又不会增加政府权力的手段。

我不想竭力鼓吹这个温和的乌托邦，因为我不清楚，男男女女是否都满足于有爱、有工作、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人们似乎还需要某些激动人心的集体事业，哪怕是破坏性的，以便超脱文明生活的日常轨道。

20 世纪初，欧洲有财产的男士的那种个人主义生活，或许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惬意的生活：这些人整日优游于咖啡厅、剧院、乡村别墅和相对原始的田园风光组成的旖旎世界中；他们的舒适有恭顺的妇女和仆人来照料；若是对艺术和科学感兴趣的话，还会做出激动人心的发现。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忍受着无聊和迷茫的折磨，以至于当他们 1914 年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觉得自己就像“跃入清澈水流的游泳者”。今天，战争当然是无法容忍的。或许有一天，我们在太阳系殖民过程中会找到更好的集体事业，但这一天太远了；并且即使那时大多数人仍将留在地球上。

我们能不能充分改变自己，让自己满足于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之中呢？行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人性的梦想，在我看来是对科学能力的最糟糕的夸张。在《三姐妹》中，契柯夫让图岑巴赫（Baron Tuzenbach）这样来回答维尔希宁的乌托邦梦想：

> 好吧，也许将来我们会乘气球飞行，夹克的款式也一样，我们可能会发现第六感，甚至还会去开发它——这我可说不清。但生活还是一样的——艰难、充满了未知数，当然也有幸福。一千年之后，人们还会像今天一样感叹，活着为什么这么难。他们还是会怕死，也不想死。

面对新的千禧年，我们可以分享维尔希宁的某些乌托邦希望；但在判断我们的生活方式实际发生变化的机会有多大时，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站在图岑巴赫一边。（郝刘祥 译）